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业主委员会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业主委员会不起诉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可以提起诉讼。”江必新说。  
　　《行诉解释》还明确了村委会和居委会的被告资格。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  
　　既力求恢复客观真实，又坚持程序公正的导向  
　　江必新说，由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所处的取证优势地位，在证据规则上也应当有相应的程序制约和倾斜，确保“官”民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实质平等的地位。  
　　为此，《行诉解释》作了以下规定：一是，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包括：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获取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二是，明确当事人的到庭义务。即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或者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三是，明确因被告原因导致损害的举证规则。即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既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又注意提高诉讼实效  
　　黄永维介绍，有的当事人认为法院没有满足自己要求不能公正审判要求法院整体回避、有的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在法院释明后认为法院打压原告而要求审判人员回避等等，这些所谓的回避申请，明显不属于申请回避的正当情形，严重影响了法庭的正常秩序，有必要加以规制。  
　　对此，《行诉解释》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明显不属于法定回避事由的申请，法庭可以依法当庭驳回。  
　　“个别当事人将法庭当成发泄个人不满的舞台，不服从审判长指挥；个别当事人藐视法庭不举证不陈述，致使庭审无法进行等等，严重背离了行政诉讼的目的，损害了司法权威。目前，在行政诉讼领域，这种情况比较突出，必须依法予以遏制。”江必新表示。  
　　对此，《行诉解释》规定，原告或者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导致庭审无法进行，经法庭释明后仍不陈述意见的，视为放弃陈述权利，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近年来，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成效明显。例如，山东法院2015年开庭审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达1637人（次），比2014年增长4倍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既体现了法律对于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的要求，也体现了行政纠纷实质化解的立法宗旨。”江必新说。  
　　为了进一步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诉解释》适度扩大了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即，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1至2名诉讼代理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  
　　《行诉解释》还明确，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对“告官不见官”，《行诉解释》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的或者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  
　　既维护合法文件效力，又防止不合法条款实施  
　　江必新说，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规范性文件等“红头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于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不得作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行诉解释》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或者超越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范围的；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或者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未履行法定批准程序、公开发布程序，严重违反制定程序的；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规定的情形。  
　　根据《行诉解释》，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上一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机关。情况紧急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制定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立即停止执行该规范性文件。  
　　为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深圳铁路警方联合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在深圳北站投入20台警用机器人，组成机器人警察编队，为春运保驾护航。这支“特殊”的安保队伍集众多功能于一身，不仅可以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治安巡逻、监控报警，还能为旅客提供安全咨询、资讯播报等服务。      
　　图为小旅客与警用机器人互动。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你们错了。”面对几名前来维权的广东省雷州市附城镇英山村村民代表，邓正保在听完他们维权经过并看了其写给省委巡视组等部门的信访材料后，一开口就让村民代表们一脸愕然。  
　　原来，这几个村民所在的英山村委会认为当地政府在征收英山小学土地的过程中，其行政行为侵害了该村的合法集体财产，但该村在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后，却被作出了不予赔偿的决定。为此，该村就走上了上访维权的路，而当时正在湛江市中立法律服务社担任值班律师的邓正保接待了他们。  
　　“我们没错。”几位村民代表愤愤不平，“小学是我们建的，地也是我们的，政府征了我们的地，损了我们的财产不赔，我们哪里错？是政府错！”  
　　“我说你们错了，不是说你们维权诉求不对，而是说你们维权的路子不对。”邓正保直言，“你们想想，为了上访你们花了多少钱、多少精力，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政府违法，就应该用法律手段使其赔偿。”  
　　邓正保劝道，上访解决不了涉法涉诉的案件，而且一旦超过了诉讼时效就更难办了，“要信法、不要信访，我建议你们走法律程序起诉政府，我来帮你们打官司。”邓正保同时告诉他们，中立法律服务社是隶属于湛江法学会的免费法律服务机构，从而打消了村民代表们担心开销太大的最后一点疑虑。  
　　邓正保代理该案后，先后3次到英山小学查看现场，4 次组织村民代表针对本案进行座谈，走访了英山小学和英山南村，反复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并同村领导班子反复沟通交流，向他们宣传法律、阐述诉讼方案。之后，该村启动了诉讼程序，对雷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赔偿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向湛江中院提起诉讼。  
　　但是，一审法院判决却驳回了英山村委会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的驳回，让村民信法的信心受到了打击，村民们开始疑虑，甚至有位村民说：“邓律师，民告官，如上山，难！”  
　　“你们去信访就是指望领导过问后去解决问题。”邓正保说，“但领导代替不了法，这是个涉法涉诉案件，上访到哪里最后也得走法律程序。我已经70多岁了，也没有必要骗你们，既然都信了我一次，何不再相信我一次。”  
　　经过邓正保反复给村民们讲解法律知识，最终说服了其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17年9月15日，该案终于迎来了转机，广东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和政府的《行政赔偿决定书》。  
　　听闻消息，村民专程赶去找到邓正保，感谢他让村民坚持用法治的方式维护合法权利。邓正保说：“稳定源于法治，作为一名党员律师，更需要用优质的服务去激发人民相信法律、信仰法律。”  
　　□对于打着保健的幌子蒙骗老年人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坚决给予查处，特别是对于其中违法营销宣传、欺诈销售保健品，违法发布广告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每逢年节，一些无良经营者往往以“感恩答谢”“回馈老客户”的名义，通过频繁组织老年人参加免费的招待会、恳谈会、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旅游、赠送礼品等活动，诱骗老年消费者购买质次价高甚至是“三无”保健品，有的甚至打着“无效退货”或“交付订金就可终生免费享用”的幌子，在骗取老人钱款后即逃之夭夭。  
　　这一类专为老年人设下的“套”，在许多年轻人看来或许缺少吸引力，但事实上却是有意地利用了老年人的心理弱点。比如有老人在一家医疗器械免费体验店试用了一台“理疗床”，居然花了1万多元买下这种商家号称能“包治百病”的床。如此“神奇”的疗效显然是无稽之谈，但是，由于许多老年人对于健康养生有着强烈的需求，又加之子女长期不在身边，日常生活比较孤独，心理需求上的空白容易被乘虚而入，从而加大了受到诱骗的风险。  
　　损失钱财事小，一旦误导老年人对疾病的正确认知和及时治疗，其后果则不堪设想。一些医疗器械产品和保健产品经营单位为了达到高价推销其产品的目的，不仅大肆夸大其产品的所谓“功效”，甚至有的还向老年人灌输“医院无用论”的观点，声称靠机器就能治疗一切，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误导，进而造成老年人身患疾病时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事实上，许多商家对于自己的“忽悠”行为，心里也不免心虚。有的医疗器械和保健品免费体验店为逃避监管和打击，一般不直接销售产品，而是大谈特谈产品如何“神奇”——一旦顾客心动购买，则由生产厂家直接上门销售，而且不开具正规发票，导致监管部门即使接到群众举报，在查处时也找不到任何销售证据。有的体验店则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某地经营一段时间后，改头换面再到其他地方经营，让监管部门的查处更为艰难。  
　　老年人晚年的健康幸福，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的温馨和睦，也是社会安定祥和的重要方面。对于打着保健的幌子蒙骗老年人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坚决给予查处，特别是对于其中违法营销宣传、欺诈销售保健品，违法发布广告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责任。遏制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违法营销保健品的行为，除了法律不能缺位，更需要强化企业守法诚信意识，加大新闻媒体的曝光和宣传力度，让全社会都参与到关心老年人健康生活的行动中来。  
　　“红头文件”因往往套着象征权威的“红头”而得名，泛指政府机关发布的措施、指示、命令等非立法性文件，长期以来都是各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抓手。  
　　实践中“红头文件”的产生数量最多、使用范围最广，可其中存在的“任性”问题也最为突出。近期，作为规范“红头文件”重要依据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两部行政法规，迎来了2002年施行以来首次修改，修改后条例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红头文件”的治理事关法治政府建设的成败，如何推动国家立法的精神有效落地贯彻到各地的实践中，也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智慧。目前，多地已就治理“红头文件”展开积极探索。  
　　严格审查，逢错必究  
　　“红头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是防止行政规范性文件逾越“红线”的防火墙。  
　　2017年，贵州省政府法制办收到贵州省润黔水利商会关于各地州市、县政府及部门制发的《会议纪要》《通知》等形式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申请，并收到省政府督查室转办反映修改、废止该类文件的网民留言。  
　　经审查并会同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国税等有关主管部门研究，法制办发现部分市、州政府，县（区、市、特区）政府及部门制发的涉及企业注册登记和缴纳税款的《会议纪要》《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一致，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公平竞争。  
　　为此，省法制办及时制发纠错通知，要求涉及此类行为的政府和部门要立即组织开展相关规范性文件修改、废止工作，立即停止执行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及时消除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7年以来，贵州省政府法制办按月组织对各市州政府和省直各部门报备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共对269件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审查，提出38件审查意见，并将审查通过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及时在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布。  
　　“为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不逾‘红线’，贵州在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中，实行‘逢文必审’和‘逢错必纠’，严格设定‘紧箍咒’。”贵州省法制办党组书记、主任唐林说，“明确要求政府或部门规范性文件必须经本级政府或本部门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的，不得发文。凡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坚决予以纠正。”  
　　及时清理，增强统一性和权威性  
　　历史形成的“红头文件”繁多芜杂，如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不及时，极易导致整个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不配套、不协调，从而影响行政规范性文件在适用上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2017年福建省政府将《福建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等13件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列为废止项目，将《福建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修订）》《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等13件法规列为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项目，并将《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改）》等28件列入计划；将《福建省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等13件省政府规章列入修改项目。  
　　事实上，这些包括“红头文件”在内的法规规章能得到清理，正是福建委托第三方评估清理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的成果。福建省政府法制办有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以来由该省法制办牵头组织，委托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4所高校，对党的十八大以前制定颁布的217件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进行全面评估清理。  
　　据了解，4所高校最后形成省级地方性法规评估清理报告133件，省政府规章评估清理报告84件，评估清理报告共计320余万字。共提出法条修改意见4000余条，其中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工作的意见810余条，涉及立法结构调整、立法瑕疵补正、文字表达改进等诸多方面。  
　　“这是近年来我省规模最大的一次法律研究类政府购买服务，也是政府部门首次以竞争性磋商的方式购买法律研究类服务。”福建省政府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其评估清理的范围之广、跨度之大在全国也属罕见。  
　　立法听证汇民智  
　　在大城市土地稀缺、楼价高企的今天，地下空间扩张在所难免，如何平衡消防安全利益与市民的居住、从业利益，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2017年9月27日，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以及网络媒体上发布了《关于举行〈广州市消防规定（草案）〉立法听证会的公告》，向社会各界公布了举行立法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听证事项、报名方法等内容，并向社会公开征集15名听证代表参加听证会。  
　　在立法听证会上，15名代表对广州市住宅小区物业公司如何管理占用消防车通道停放机动车辆的行为、住宅小区是否该建微型消防站、地下空间是否该禁止使用明火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充分的意见表达，多数代表倾向物业公司要严管住宅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条件的住宅小区要建微型消防站，以及地下空间宜禁止使用明火。  
　　像这样的从源头约束“红头文件”任性的立法听证会正越来越多。广州市政府法制办近年来将举办立法听证会制度化，一般每年选取1至2个社会关注度高、与广大市民利益切身相关的立法项目草案议题进行听证。  
　　“为不断完善立法公众参与制度，广州市法制办还在立法听证会形式方面不断地推陈出新。”广州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在2015年举办了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的“五类车”“禁售”制度现场立法听证会，2016年则举办“气瓶安全”、“临近保质期和过期食品”网络立法听证会，“事实上，此次关于消防的立法听证会更是采取‘线下’+‘线上’的模式，在现场听证会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兼具现场的‘深度’与网络的‘广度’。”  
　　治理“红头文件”难点在基层  
　　“滥发红头文件、特别借此排除和限制竞争、干预微观经济、限制市场主体和公民权利，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任进表示，有的组织和个人利用红头文件设租寻租，甚至插手工程招标、政府投资、土地转让、政府采购和人事任免等，容易滋生腐败。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不符合党委领导经济主要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也不符合地方政府要依法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要求，从而影响职能科学、权责法定的法治政府的建设。  
　　2017年9月26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7》，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曹鎏介绍，在“红头文件”治理方面评估结果显示，市级政府的得分率总是高于所属职能部门和区县政府，“这也充分说明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基层，政府级别越低，规范性文件建设较为薄弱，问题较为突出的基本状况。”同时，曹鎏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些地方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进程缓慢，短板明显，已经成为当前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制约。  
　　“中央立法是能够彻底实现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有效、统一规制的必要之举。”曹鎏建议参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基本思路，由国务院制定一部能够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方位规制的行政法规，具体内容应当涵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界定、制定条件、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以及监督与问责等方面。  
　　  
　　关键在约束权力任性（短评）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总体目标，而“红头文件”治理就是其中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治理“红头文件”首先要在程序上进行规范。如果在制定环节缺少必要的程序约束，那么行政机关的随意发文，就极易对老百姓的权益产生不利影响，对法治的破坏也是不言而喻的。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立法”，无疑是对法制统一与合法程序价值的再次肯定。  
　　然而，要解决“红头文件”背后权力“任性”这个实质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以民主立法促进科学立法的道路上来。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往往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会直接产生影响，因此与之利益相关的群体不仅关心，更可能有大量的“民间智慧”值得挖掘。而作为权力监督、公众有序参与的前提，立法过程的公开与透明对于实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项公共决策的出台，要让公众以各种形式有序参与其中，这不仅能够提升立法决策的质量，更重要的是通过“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民主协商，让政策能够真正在执行中落地，避免新的问题产生。  
　　□打击和整治农村赌博问题，既要培育“不敢赌、不能赌”的法治氛围，又应营造“不爱赌、不想赌”的文明环境  
　　  
　　“辛苦挣钱一整年，春节输光就几天”……近年来，春节返乡聚众赌博比较普遍，甚至呈现出参赌方式更趋多样化，向“网络空间”转移，向更隐蔽空间转移等新特点。  
　　事实上，这只是农村赌博问题日趋严重的一个缩影。在一些农村地区，不少村民染上赌博恶习甚至以赌为业，导致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更有甚者还走上了盗窃、抢劫等犯罪道路。农村赌博之风不及时遏制，不仅严重影响家庭和谐幸福，严重败坏乡风文明，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基层治理的老大难、乡村振兴的绊脚石，必须严厉打击和整治。  
　　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公安部近日印发《关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在春节前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将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将农村赌博问题放在春节前后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来抓。  
　　打击和整治农村赌博问题，首先应培育“不敢赌、不能赌”的法治氛围。一些地方之所以赌博成风，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对此重视不够，模糊了聚众赌博与休闲娱乐的界限，对于事实存在的赌博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真正“亮剑”，导致一些人有恃无恐，赌风越刮越盛，筹码越下越大。打击整治农村赌博活动，需要“实打实”“硬碰硬”，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坚持“露头就打”，同时还要严厉打击暴力护赌、催逼赌债的黑恶势力，做到“保护伞”不挖除不放过，形成依法惩处的强有力震慑。  
　　打击和整治农村赌博问题，还需营造“不爱赌、不想赌”的文明环境。农村赌博行为多发，与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较单一、攀比之风盛行不无关联。一方面，不少外出务工者早已适应城市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然而在返乡后却找不到合适的文化娱乐载体时，走上牌桌、参与赌博极易成为不自觉的选择。另一方面，在“衣锦还乡”思想的影响下，返乡村民难免产生攀比心态，此时赌桌上的“票子”成了实力的“例子”。  
　　各级相关部门应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倡导文明法治乡风，培育健康向上的新风新俗。同时持续推进文化下乡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补齐农村文化生活短板，引导广大村民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评判体系。如此，才能真正让农村赌博之风涤荡一清，让文明法治乡风滋养人心。  
　　近日，江苏大学和江苏省镇江市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的志愿者来到辖区建设工地，现场挥毫泼墨，为外来务工人员义务书写“福”字，向城市建设者们送上新年祝福。  
　　图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展示志愿者为他们书写的“福”字。  
　　石玉成摄（人民视觉）  
　　【案情】张某、陈某是一蓄电池公司的员工。2015年12月16日，张某等40人在公司后勤楼更衣室利用扑克牌进行赌博。在此期间，派出所民警到该更衣室进行检查，现场查获涉嫌赌资15570元、弃置赌资6150元，抽头渔利款100元，赌具扑克牌一副。公安局民警随即采取了证据保全措施，对上述查获的涉案物品进行扣押，并将在场的张某、陈某等41人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调查，陈某为赌博提供扑克牌，并抽取100元作为提供赌具的劳务费，张某参与了赌博。公安机关认定陈某为赌博提供条件，决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500元，收缴赌具扑克牌一副，追缴违法所得100元；对张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决定。  
　　二人不服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安机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依法予以支持。  
　　【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本案中，陈某为张某等40人赌博提供赌具扑克牌，并抽头渔利100元，被现场抓获。陈某实施了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理法官指出，又因参与赌博的人数多达40人，且弃置赌资高达6150元，公安机关认为陈某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本报记者  魏哲哲整理）  
　　浙江东阳，寒风刮过山头，寒意袭人。  
　　51岁的农民刘巧萍仍是热情不减，提着一只盛着4种不同颜色的油漆桶上山了。来到自家承包地后，她给余下的10多棵香榧树苗描画防盗“二维码”。一旁，浙江省东阳市公安局虎鹿派出所副所长何国帅也赶了过来，和刘巧萍交流如何更好更方便地描画。  
　　刘巧萍是虎鹿镇尚周村人。她家的800多棵香榧树，一年收获的香榧干能卖到近10万元，是实实在在的“摇钱树”。整个虎鹿镇约栽种有40万棵香榧树，村民多以种植香榧树为主业。靠着香榧树，大家不出远门就过上了小康生活。  
　　然而，2016年11月份的一个深夜，刘巧萍栽种两个多月的200多棵香榧树苗被偷拔，心疼得几天几夜吃不香睡不宁。后面几个月，还有好多农户也陆续遭灾。  
　　处置香榧树苗被偷案成了虎鹿派出所的“重头戏”。每次警情报来，民警就得驱车半个多小时，来回至少半天，而且可供使用的证据不多，破案不易。  
　　“后来，有村民想到给香榧树描画防盗标记的做法。但各自描画，难以辨认服众。如果统一设计、统一编码，就便于操作和识别了。”虎鹿派出所所长马乔栋想出新办法：“我们结合当前公安机关正在开展的‘基层基础和治安防控’工作，针对香榧树（苗）防盗难题，为香榧树（苗）配画防盗‘二维码’。”  
　　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虎鹿派出所联合相关部门及村委会成立香榧保护委员会，建立专项经费，统一采购油漆免费分发给村民，对每户人家的香榧树苗进行登记，油漆颜色定为红、黄、蓝、绿、白、黑，在香榧树树干上